

# 周素园与贵州旧民主主义革命

□ 陈朝祥

(毕节师专政史系, 贵州 毕节 551700)

**摘要:**在清朝政腐败、国难日亟的形势下,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使周素园冲破了封建道德伦理规范的樊笼,走上维新救亡之路,进而创办自治学社,领导贵州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在贵州的统治。建立了大汉贵州军政府。军政府被反动势力颠覆后,周素园为挽救革命,流亡渝、汉、京、沪等地,辗转于南北军阀之间数十年,看到了军阀的祸国殃民,决心不再屈从军阀的要挟,走上重新努力探索自己人生道路和中国出路的新征程。

**关键词:**周素园;旧民主主义革命;维新救亡;自治学社;辛亥革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96(2004)01-0025-05

## Zhou Suyuan And Guizhou Democratic Revolution of The Old Type

Chen Chaoxiang

(Politics and History Department of Bijie Teachers College, Guizhou, 551700)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corruption of Qing Dynasty government and national calamity urgency, an intense patriotic thoughts makes Zhou Suyuan break through the state of confinement of feudal morality standard, going towards reform and establishing a self-governing association. He leads the Revolution of 1911 in Guizhou and overthrows Qing government control in Guizhou to set up Han military government of Guizhou. After the overthrowing of military government by the reactionary forces, for saving revolution, he goes into exile to Chongqing, Wuhan, Beijing, Shanghai and many places and pass through Southern and northern warlords for several ten years. Seeing the warlords bringing calamity to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he decides not to submit to their pressure, going towards trying to explore his life and way out of China again.

**Key Words:** Zhou Suyuan; Democratic Revolution of the Old Type; Reform Saving; Self-governing Associati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 一、走维新救亡之路

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成了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它击碎了中国人文化中心主义的种种迷梦,他们终于认识,中国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中国学习和认识西方不够,无法以低度的“西洋化、近代化”抗衡高度的“西洋化、近代化”(蒋廷黻语)。严复就这样大声疾呼“驱夷之论,既为天之所废而不可行,则不容不通知外国事,欲通

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sup>[1]</sup>,他明确指出:“欲救中国之亡,则虽尧、舜、周、孔生今,舍班孟坚所谓通知外国事者,其道莫由。而欲通知外国事,则舍西学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一言富国阜民,则先后始终之间,必皆有事于西学”。<sup>[2]</sup>中国至此掀起了由学器物到学制度的西

作者简介:陈朝祥(1970—),汉族,男,贵州毕节师专政史系讲师,从事地方史研究。

化热潮。这也是16岁的周素园(字培艺,1879年生于贵州毕节县城)人生旅途的第一个思想转折。他写道:“中东之役,丧师辱国,强邻环伺,惧陷瓜分。我辈尚不亟谋改良政治,以图救亡,宁再事咬文嚼字耶?”<sup>[3]</sup>

深重的民族危机,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地植根在他心中,他走在了贵州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前列。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他摒弃“读书做官”、“显亲扬名”的抱负。为寻求富国强兵之道,拯救危亡之中国,发愤自强,努力觅取新书、新报,以获取新思想,新知识。如读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续富国筹》、《出使英、法、意、比日记》、《海国图志》、《万国史记》、《万国公法》、《泰西新史揽要》、《时务报》、《湘学报》等。通过学习,对西学有了深入了解,并接受维新派的“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sup>[4]</sup>的主张。他赞同管子的“仓廩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民不足,乃令辱;民苦殃,令不行”的思想。国家必先裕民生,乃能进民智。他认为现实“注意教育以开民智,提倡实力以抗外力”<sup>[5]</sup>尤迫切。于是他萌生了去日本留学求取新知以救国的念头,因病未成行,后在毕节、普安教书育人,传播新思想。云南巡抚林绍年调任贵州途经普安时,周素园代闵华甫写了一封条陈,谈贵州应办的事,着重是派遣学生出洋。得到了林绍年的赏识、采纳。林绍年到任后,通令每一行政区域就地筹款,至少派遣留日学生一名,学习短期师范,停办有名无实的“贵州大学堂”,移动款项,考送留日长期学生二十名,分修各种必要的科目。这一措施,震动了全省,贵州掀起了学习西学的风气。周素园也参加了应试。但作为落后、闭塞、贫乏的贵州,急需周素园这样的人才,在李端芬、于仲芳的强烈挽留,他抱着“国事为重、牺牲小我”的宽阔胸怀,担任李端芬的助手,经营贵州全省铁路矿物总公司。发展贵州的实力,作为救国的起点。然而,教育救国,实力救国对于内忧外患交加,积贫积弱至极的清王朝已经无济于事。周素园总结实力救国失败在于:“凡公共事业,类非一手一足之烈,今吾以热诚倡率,而社会冷酷报之,此非社会有不足于我也,患在愚昧而无知”,<sup>[6]</sup>而“报章之职务,于社会无所不问。而在革新初期,其需要尤迫切……,发行日报,举指导社会之实,更积岁月,效果当有矣”。<sup>[7]</sup>他转而从开通民智入手,鼓吹爱国救亡、变革社会。经过两年的精心筹备,在于德楷等人的支持下,1907年6月,他创办了贵州近代第一份报纸《黔报》,任《黔报》主编,宗旨是“开通民智”,内容涉及社论、电报、新闻、特载、小说等,

以报道评论时局为特色。如“方今外侮存至,内政又不复不修,上、下相蒙,政以贿存。嗜利黷货,结习深中于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天下之人以为筮仕皆以牟利,固恬然不知怪。夫如是故汲汲以官为寄,而惟剥削侵渔之是务。民积困而不苏,国亦积弱不振”<sup>[8]</sup>。“今日时流标榜,方以学堂相夸耀,而仆鳃鳃焉。……教习无通人,学生无正士”,“岂能淬励知识,开拓心志耶?以言育才是适燕南辕之说也。抑仆观今所谓变法,皆将徇人,非以为果有益于我也。政府虑外人之迫,则以变法缓之;直省希政府之旨,则以变法媚之。究竟破除积习者何人,实力奉行何事!祸患之兴,正未知所终极,不出数年局面又将更易。”<sup>[9]</sup>“溯自甲午一役,吾国腐败之现象,始轩然豁然呈露于五大州。而千年睡狮,乃稍稍破其沉酣之梦。庚子国变,祸亦亟,事亦亟。而欧化潮流亦益澎湃汹涌而不可遏抑。以今日之智识程度,较之五年前,则有进矣;较之十年前,则大进矣;厄我者之适以厚我,弱我者之适以强我。异日同胞有立,敢不拜东西大东国赐?”<sup>[10]</sup>“瓜分之图,均势之论,喧阗腾播于人人之口”。<sup>[11]</sup>而清政府“堤溃防决而营谋私利如故,栋折榱崩而粉饰升平如故”。<sup>[12]</sup>他尖锐地批判了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清封建王朝的对内假维新,不过是收回已涣之人心,消弭方兴之革命,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的真实面目,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狼子野心。分析了“欧化潮流”,即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本主义工业化,及科学文化迅速发展的潮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号召世人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以改造落后的中国。1907年10月27日,《黔报》九十五期新闻栏发表《瓜分警告》一文,揭露《日俄协约》《日法协定》中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阴谋。他认为“然当此存亡绝续之交,生死骨肉之际,惟万众一心,作多方面的努力”<sup>[13]</sup>、“吾人欲求救亡之术,惟有一德一心,结合团体,化除私见,共谋公益”。<sup>[14]</sup>面对危局,他认识到了组织革命团体,进行多方面革命活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号召人们以国家利益为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共谋革命,为革命而献身,将革命进行到底,直至建立新的社会。《黔报》对时局的报道评论,道出了贵州无数青年人的心声,他们纷纷来信表示:“你说的都是我们想说的话,贵州本是一个盲哑的社会,你给我们带来光明和喉舌了。你要维护你的报,发展你的报,不要令我们甫尝生趣,又陷入黑暗和苦闷的深渊里!”<sup>[15]</sup>《黔报》如一股强劲的春风滋润、震动了贵州许多的青年知识分子,打破了贵州社会的沉闷气势,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传播了先进的思想,唤醒了爱国志士的革命救国热忱,为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作了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

## 二、创自治学社

经周素园《黔报》的启蒙和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以及留日学生的返乡播下的革命排满种子,双重压迫下的贵州,民情思变,知非国民革命,不能救国救民,革命团体,乃应运而生。此时所有之革命团体如下:(一)张铭、平刚、彭述文、漆运钧等组织之科学会。(二)朱焯、安健、方策、王度等主持之友助会。(三)熊天泽、朱涣、王宪章、陈纯斋等主持之贵州公社。(四)席正铭、阎崇阶等主持之历史研究会。(五)周素园经王子 联系与张百麟相识,当时周素园的思想只注重办报。张百麟说:“报馆只能算是政党的一部分,有党,才能发生大的力量。参与政治,也要以政党领袖的资格出现。”<sup>[16]</sup>在张百麟帮助影响下,周素园抛弃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投身到了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激流之中。1907年11月27日与张百麟一起共同筹划成立了自治学社。选举张鸿藻为社长,张百麟负实际责任,周素园起着核心作用。张百麟对周素园说:“你的事太繁,一切琐屑都由我去负责。只有党的路线要你参加决定,党的事业要你尽力维持,应付官厅社会,你需利用你的地位,为党谋生存发展”。<sup>[17]</sup>从这以后周素园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性的群众团体和官府幕僚工作,以推进革命运动。

自治学社的宗旨为“研究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之说。以国民责任为大前提,以个人自治为单位,务期人人有道德智识,养成善良品性,造就完全人格,以赞助地方自治之实行,达国家自治之希望”。<sup>[18]</sup>本着“建设贵州,结合西南,以恢复中华”之企图开展革命工作。具体任务是,担负贵州国民革命策动、训练、宣传之责,求与各省同志,在同一号令下,一致行动。同时为求工作顺利,事机秘密起见,决定采用下列特殊机构与范畴。

(1)三层组织:“中心”、“骨干”、“外围”;

(2)三部分工:“干部”、“党部”、“自治学社”;

(3)二幕方式:对外活动用饰名“自治学社”对内用“同盟会贵州分会”、“国民党贵州支部”;

(4)两重政策:形式:组织政党,实际:厉行革命;

(5)教育方面:筹办公立法政学校,把光懿小学、贞静小学、乐群小学并入陆军小学校,为革命培育骨干力量;

(6)宣传工具:西南日报,自治学社杂志等;

(7)政治方面:学社主要领导人是官府参予机密的幕僚,他们运用昏庸之清吏投其所好,操纵指挥;

(8)民众方面:发扬民族革命精神,并检举官僚贪污之事实,以激发革命思想。

自治学社成立后,组织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

(一)组织建设。关于入党资格,周素园主精以求才,张百麟主宽以容众。后经辩论,以本党支柱平民,解除男女、阶级、种族、宗教等一切限制,凡赞成本党主义,适合社章者,即为本党党员。为发展组织,他们还进行了舆论准备。在舆论宣传中,周素园因激进的思想与黔报的出资者和资产阶级立宪派相抵牾而遭排斥,他转而与张百麟共同筹办自治学社的机关报《西南日报》,并任主编。以《西南日报》为阵地,与宪政党(其机关报为《黔报》)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组织演讲团广泛宣传政治、经济现象,抨击时政,谈到政乱国危,非结合团体,不能救亡。经过舆论宣传,先后在各地成立了五十余处分社。

(二)拟定贵州的民情风俗、政治、经济等领域诸多问题的提案,并组织成员对提案内容进行广泛详细深入的调查研究。为今后的治理决策提供了正确依据。

(三)积极参与贵州谘议局的选举。政党活动,以竞选控权为中心。1908年,贵州举行谘议局选举。自治学社准备充分,除遵义一区、牟琳等宪政党有所组织外,其余各区,皆占优势。各自治公所、自治研究所等机关占了多数席位。周素园先后担任贵州警务公所地方自治筹办处科长、贵州谘议局筹办处书记、贵州商务总会文案、贵州教育总会书记、贵州学务公所议绅、贵州农务总会书记等职。张百麟任贵州审判厅提法公所科长。两人办事果敢,业绩显著,得到上司的信任和群众的推崇。彭述文、平刚、杨寿钱、钟昌祚、张鸿藻、黄泽霖、张百麟、龚延栋、宁士谦等进入教育界,筹办乐群学堂、正谊学堂、光懿女子学堂、自治研究所、司法讲习所、监狱专所科等。授课之余,宣传革命精神,遍播革命种子。

(四)大力举办公共事业。钟昌祚组创贫民工厂,下设机关读书堂,教识字写算,训话室教处世作人正轨、旁及国内国际大事。储蓄部、消费社对外接洽。周素园发起成立慈善会,救助孤寡贫弱者,许多奴仆获得了自由。公共事业的举办,使自治学社赢得了人心,“人道之声,洋溢里姬村妇间”。<sup>[19]</sup>贺国昌喜曰:“花旗八年血战之结果,吾侪安生数月而得之,解放信有时哉”。<sup>[20]</sup>

(五)发起开国会请愿活动。1909年夏秋之交,开国会请愿运动风靡全国。周素园代表自治学社召集各界开会,被推选为《请愿书》撰稿人。《请愿书》征得贵州各界代表签名后公开发表。要

求开国会，颁布宪法。这是自治学社开展的一次争取民主权利的宣传运动。

(六)国民捐会活动。1910年，为声援天津商会发起的筹还国债运动，自治学社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规模的群众性国民捐运动。投票选举周素园为国民捐会副会长并起草相应章程。他们印发传单，组织演讲，“风雪兀立，涕泪交迸”<sup>[21]</sup>，唤起同胞注意，使他们知道国际地位之危迫，实借办国民捐，集款购械，以谋起义，但遭宪政党的破坏而失败。宪政党以他事为借口逮捕街口负责演讲的陈永锡，自治党人中的因此而害怕退缩，周素园却更加坚定，以革命之大道鼓舞士气，曰：“我辈革命死，不革命亦死，等死耳。要以革命死为最大荣，何惧哉！”<sup>[22]</sup>。自治学社一系列革命活动开展及领导人的苦干精神，形成同志间“公而忘私”、“义而忘危”的共同风尚。革命势力，日愈澎湃。全省十三府三厅四十八州县城乡各级自治议董会，多为分社社员主持，民众觉醒，踊跃参加，正式社员达14.8万人。组织了一支浩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大军。张百麟将自治学社组织工作详情密送同盟会贵州支部长平刚，转呈孙中山先生后，经考查结果，准自治学社加盟为贵州分会，同盟会贵州支部的成员，也都参加了自治学社，自治学社的基础更巩固，成为能左右贵州社会的强大政治势力。

### 三、辛亥革命的成功

庚子之变后的中国，风云际会，出现了革命、改良、朝廷三方格斗角逐的社会格局。革命派要以暴力推翻清朝，改良派则以改造王朝，推行君主立宪为己任，清廷在革命与改良的夹击中进行王朝的自我挽救。在同一过程中，下层群众则以千波万澜的民变发泄了对腐败王朝的怨愤和不满。“山雨欲来风满楼”，反动的清朝封建专制政权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1911年，清政府出卖粤汉、川汉铁路的行径，激起了粤、湘、鄂、川四省人民的强烈反对，迅速掀起了群众性的保路运动。四川的保路运动尤烈。民气激昂，组织了保路同志军，决定举行武装起义，遭川督赵尔丰镇压，制造了“成都血案”。贵州巡抚沈瑜庆应赵尔丰之请派兵协剿同志军，又向英、美、德、法四国借款建筑贵渝铁路。两事皆违反民意，民情震愤。周素园与张百麟、陈永锡积极筹划组成新的武装力量，推翻清封建王朝政权，张百麟最初的计划只是依靠哥老会，由懂得军事的自治学社社员任统将，分赴各县，号召土匪、秘密会党、团丁，能纠合三十人的，即授排长，纠合百人的，即授连长，能纠合五百人的，即授营长。兵分四路，在全省发难。俟省城空虚，攻军械局，夺取贵阳。周素园持不同意见，认

为不能草莽式的革命，应集中力量做军队工作。特别是争得常备军的支持。后形成决议两策并进，周素园主动承担运动贵阳警界支持革命党人反清。另派社员骨干力量联络征兵营、巡抚卫队、巡防队常备军、陆军分校、教育总会、各公私立学校、哥老会等。以这些力量构成武装起义的基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湖北宣布独立，紧接湖南、陕西、云南宣布独立。自治学社乘武昌起义后的大好革命形势，决定11月4日发动武装起义。11月1日，自治学社宪政党由斗争达成了妥协。11月2日，周素园、张百麟冒死入巡抚署劝巡抚沈瑜庆顺从民意，和平地交出政权。沈瑜庆口头同意，暗中令刘显世部退回贵阳镇压自治社成员。自治学社领导人见形势危急，趁省城防务空虚，决定立即武装起义。11月3日兵不血刃推翻了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11月4日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军政府合都督府、枢密院、行政总理三部分组成。周素园是枢密院七枢密员之一，又担任行政院总理，主持全省民政的除旧布新。他说，从这一日起，“好似一条铁链锁我在一间房子里。一张办公桌上，把旧日一院（巡抚）、三司（布政使、提学司、提法司）两道（巡警道、劝业道）和一二百位秘书、科长、科员分担的职务，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耳是不断地听，口是不断地在说，手是不断地在写，吃一餐饭，也得放下碗筷来酬对两三次；鸡鸣后上床睡觉，还让你披衣起来解决问题”。<sup>[23]</sup>每日劳心劳力，亲自批复公文数百起，安定内部，驰檄讨满，通令官员，整顿财政，勿许擅离职守等，几乎没有片刻闲暇，并积极参与策划贵州革命派军队援川、北伐的行动等。周素园曰：“中国行省二十有二，革命军已光复者仅及四五，前途尚多艰巨，况川黔利害，异常密切，我亟助川独立，有事则川为我障。反之，川为清有，即我沿边数百里处处吁食矣。又兵额骤增饷源益涸，它日财政必有不支之虞，不若大举援川，公私交济”。<sup>[24]</sup>军政府采纳了周素园的建议，公推黄泽霖为援川总统。都督杨蔭诚率师北伐。这时期，周素园殚尽竭虑，为军政府的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就在革命取得不断胜利的同时，自治学社领导人犯了不可避免的错误：（一）没有制定切实的措施维护人民的利益，革命的巩固缺乏群众基础。（二）用人不当，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旧军官把持军队。（三）任命立宪党人担任许多重要部门的职务，“肘腋之下，布满了敌人的势力”<sup>[25]</sup>（四）未及时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对革命队伍进行改造和整顿，内部矛盾重重。（五）革命带有狭隘的民族主义，不利于团结。光复后的军政府称大汉，曾引起镇宁布依族苗族不满，张百麟被迫率部出巡

上游进行安抚。(六)看到援川、北伐大局的重要战略意义,而疏忽了自身防御。这些纵容了反革命势力的发展,削弱了革命自身的实力。给反动势力以可趁之机,革命败象显露。

#### 四、绝境中探索救国之道

1912年3月,以刘显世为代表的贵州封建势力联唐继尧的滇军颠覆了贵州军政府,成立了滇军与贵州立宪派及旧官僚的联合政权。这次革命虽败,但以民主选举制代替封建独裁制,是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的一大跃进,在新旧递嬗的历史进程里留下了自己不可磨灭的影响。反动联合政权成立后,对革命派大肆诛戮。自治社员云流星散,纷纷逃亡省外避难,因周素园在政界的威望暂未遭毒杀。唐继尧任命他为石阡知府,想利用他的威望安抚民心,周素园勃然大怒,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立宪党人便设法迫害他。为挽救革命,周素园被迫流亡重庆、武汉、北京、上海等地。联络流散的革命同志,组织黔人冤愤团,并执笔写成《贵州血泪通告书》、《黔人冤愤团宣言书》、《以临时稽勋局议贵州革命始末书》以及《致北京政府》、《致国务院》、《致孙中山》、《致袁总统》等的函电。将自治学社革命经过及宪政预备会与唐继尧等破坏贵州革命情形一一叙述,揭露刘显世在贵州的革命暴行,声讨滇军,为革命派呼吁,伸张正义,为自治学社正名,为贵州省在辛亥革命前后参加革命活动有功人员请功授勋。经他的努力,袁世凯政府同意优恤革命烈士,查办唐继尧、刘显世。但接着宋案发生,二次革命爆发,形势逆转。赣宁之役,唐继尧有功于袁世凯,发密电诬冤愤团是革命机关,请诛冤愤团首要。周素园被作为“双重罪人”(“贵州匪党”、“全国乱党”),下令通缉。

至此,他为躲避贵州军阀当局和袁世凯的搜捕而四处亡命。此间,他贫病相煎,祸不单行,其继室肖氏难产去逝。生活上频于断炊,精神上险些崩溃。他描述当时的情境,“仆穷困羁旅,濒于断炊。非同乡诸君拯我,殆转死沟壑矣,然乞贷为生,又胡何长!”“室家累人,债台文筑,尤气短者,百病相寻,精神消索,年末四十,而衰象已如六七十岁人。出无机会,处亦困难,去租界一步,即入饿乡”<sup>[29]</sup>。他后来在《身世述略》中写道:“记得那年阴历除夕,家里是什么都没有。佣媪看不过,关照她的丈夫,送了四样菜来。我说:没有白吃的道理,况且人家也不宽裕,总得开发开发。搜索半天,还是一文没有。大女儿静一说:上午乐彩澄夫人给了小妹妹一元压岁钱。没奈何,只得借来搪塞,算渡过这一难关”<sup>[27]</sup>“真是彷徨歧路,进退失

据”<sup>[28]</sup>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正遇到重重困难,无力给予切实的支持。然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国家不能任强盗宰割,他又鼓起勇气,萌生了“无论何党何派,能解决贵州问题的,我们便和他合作”<sup>[29]</sup>于是他利用南北军阀的内讧和混战,辗转于徐树铮、袁祖铭等军阀当权者的幕府之间,希望借他们之力,向滇军首领和贵州军阀头目刘显世复仇。这种不无违心地混迹军阀营垒的生活,使他认识到军阀的祸国殃民。他在一篇文章中愤怒地写道:“一部二十二史,相斫相杀,暴君污吏,弥望接踵。吾民之憔悴呻吟,例悬不解,其已久矣”<sup>[30]</sup>。

1925年9月7日,周素园决心不再屈从于军阀的要挟,回到毕节,闭门读书著述,研读《物种起源》、《国富论》、《民约论》等一批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名著及《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通俗资本论》、《共产主义ABC》、《新政治经济学》等一批马列主义原著和介绍马列主义的书籍。他开始信服马克思主义,并反思了自己十多年间在政治风云中的得失,认识到了马列理论比自己以往认识的各种理论都有魅力,应该在中国实行。于是他重新踏上了探索自己人生正确道路和中国的出路的新的征程。

周素园经历了贵州旧民主主义革命长期复杂曲折的斗争,他和许多同时代的革命先驱一样,有过彷徨,走过弯路,但这只是他革命历程中的一点小插曲。他那勤奋好学,服膺真理、不畏强权、廉洁奉公、厚德载物的高尚人格,以及为争取革命胜利殚精竭虑、不断进取、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将永闪光芒,是激励当代青年的精神动力。

#### 参考文献:

- [1][2] 严复.救亡决论[M].李双碧.从经世到启蒙[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2.203.
- [3][6][7][15][16][17][18][19][20][21][22][23][24][25][29] 梁燕,葛美.周素园文集[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117、241、241—242、419、421、422、246、262、262、268、118、423、278、423、429.
- [4][5][8][9][10][11][12][13][14][26][27][28][30] 中共贵州党史办.贵州党史资料[J].第五辑(内部资料),271—273、282、284、289.

(责任编辑 罗仲祥)